

从“有其形”到“成其势”:强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事实与建设路径

方先明,刘源鑫,李舞岩

(南京大学商学院)

摘要:“十五五”时期是通过金融高质量发展实现金融强国,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进程中,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作为金融强国“六大关键核心金融要素”的中枢,承担着优化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增强国际金融话语权、提升国家竞争力等战略职责。立足金融强国建设的总体要求,从“功能导向”“服务导向”与“质量导向”3个维度出发,界定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使命与典型轮廓,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应具备发达的金融市场、完整的金融自主权、繁荣的金融生态系统、显著的国际影响力和强大的金融创新活力。中国具备坚实的经济基础与完善的金融体系,这为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当前,上海和香港两地已为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人民币国际化程度、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营商环境及国际竞争力等4个方面仍存在有待推进之处。为此,应持续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优化金融营商环境。遵循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指导思想,强化上海与香港的联动,由此促进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

关键词:“十五五”;金融强国;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基础设施

国家兴衰,金融有责。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擘画“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蓝图;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明了金融强国的核心要义,提出“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1]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

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以下简称“六大关键核心金融要素”)相辅相成,不仅是金融强国建设的“指南针”,明确了前进方向,也是检验成果的“试金石”,衡量着建设成效。其中,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枢纽性功能与战略牵引作用,既是贯通金融资源内外循环、实现国家金融实力向国际影响力转化的关键平台,亦是金融强国建设的关键抓手^[2]与“十五五”时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加速变革的历史关口,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既是金融强国建设

引用本文:方先明,刘源鑫,李舞岩.从“有其形”到“成其势”:强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事实与建设路径[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7(6):113-1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4&ZD092)

作者简介:方先明(1969—),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金融强国建设、金融市场与投资等研究。E-mail:fxmfxm@nju.edu.cn

的必然要求,对内承担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使命,同时作为全球金融资源配置的核心载体与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枢纽,对外肩负着提升国家竞争力、增强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战略职责。因此,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不仅是金融强国建设的“必答题”,更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实现由“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制定者”跨越的“抢答题”(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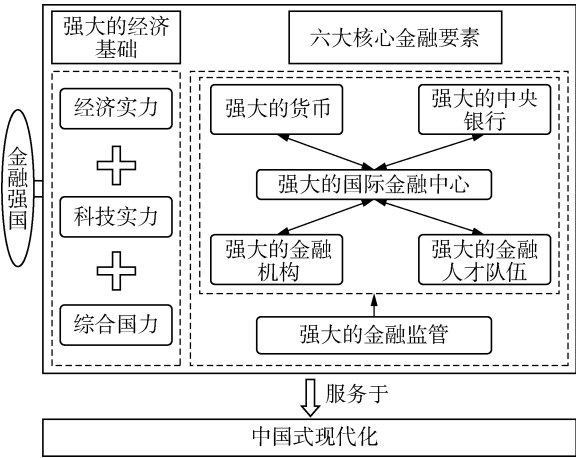


图1 金融强国的核心要义与根本目的

然而,何为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当前中国是否已有国际金融中心达到“强大”的衡量标准?若尚未达到,其与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还存在哪些潜在差距?又应如何推进其建设成为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仍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绝非对西方发达国家传统金融中心“历史范本”的亦步亦趋,更不是照搬照抄的“拿来主义”,而是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因地制宜地开辟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版本”。因此,本研究立足中国国情,从“功能导向”“服务导向”与“质量导向”出发,在界定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使命与典型轮廓后,分析中国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现实差距,由此提出相应的实践路径,以期通过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助力金融高质量发展。

一、“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时代使命

建设金融强国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3],这离不开“六大关键核心金融要素”的

协同支撑。作为金融强国之中枢,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肩负着不可替代的时代使命^[4]。面向“十五五”,在“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战略指引下,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金融监管及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五大核心要素均应深度嵌入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支持网络与制度保障体系,据此形成相互支撑、协同演进的金融生态系统。

1. 强大的货币与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相辅相成、根基相依

强大的货币不仅要求其拥有稳定的币值,更要拥有强大的国际货币地位。历史表明,主权货币的国际化与其所依托的国际金融中心存在深刻的共生关系,荷兰盾、英镑、美元能先后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货币,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关键支撑。事实上,货币国际化进程的本质就是主权信用载体在跨境贸易结算、投融资、国际储备等核心领域建立全球公信力的过程。这种公信力的构筑,离不开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所提供的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健全的制度环境与高效的金融市场,反过来,货币国际化的进程又推动国际金融中心资源配置能力的提升,促使其向更高能级演进。

2. 强大的中央银行与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同向而行、息息相关

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标志,中央银行肩负着货币发行、政策制定与风险调控等重要职能,其不仅是货币流通的源泉,更是金融稳定的“防火墙”。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是一个系统性过程,不仅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后盾,也需要成熟的货币政策体系和精准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确保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领域。而要全面激发市场活力,更需强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如支付清算体系、信用评级体系等),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为此提供了重要保障:一方面,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拥有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和众多强大的金融机构,这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广阔的操作空间。另一方面,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有助于提高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从而增强中央银行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因此,拥有强大的国际金

融中心是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3. 强大的金融机构与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同频共振、互为依托

一方面,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通过磁吸效应聚集金融机构,发挥规模经济效应。金融机构的空间聚集可以提高金融机构之间的协作效率,通过强化信息共享机制,有效降低机构的运营成本并提高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5],这为强大的金融机构的崛起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强大的金融机构需依托于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并借助其发达的金融市场、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及国际化的资源网络,实现全球金融要素的优化配置与风险防范,为全球客户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这又为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持续注入活力。

4. 强大的金融监管与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相互相促、密不可分

强大的金融监管是确保金融市场稳定运行、金融活动健康发展的关键,也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坚实保障。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为强大的金融监管提供了实践的平台与动力,反过来,强大的金融监管又为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一方面,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汇聚了众多强大的金融机构,其复杂的金融活动为金融监管提供了丰富的案例与数据支撑。同时,金融机构之间激烈的市场竞争又要求金融监管机构具备更强的风险预警、评估与解决能力,这倒逼监管部门进行监管技术的创新。另一方面,借助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化”的特征,金融监管部门让前者参与国际监管规则的制定成为可能,这也增加了金融监管部门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总的来说,二者互为支撑,共同推进金融体系行稳致远。

5. 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与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共生共荣、血脉相连

金融人才是金融中心发展的“血液”,金融中心是金融人才成长的“土壤”:一方面,国际金融中心通过构建高浓度金融资源场域,为金融人才提供优质平台,持续吸引高端金融人才聚集,且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往往拥有顶尖的

经济、金融教育资源,其自身本就是金融人才培养高地。另一方面,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产生知识外溢效应,不仅推动金融创新活动效率的提升,也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升级注入活力。

二、“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理论内涵与典型轮廓

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中心概念的深化与扩展,是全球资源配置的典型载体,其形成须具备雄厚的综合国力、深度开放的市场体系、高效的跨境资本流通渠道、专业完备的金融活动中介服务体系和便捷的全球信息联通网络等核心条件^[6]。然而,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绝非外在客观要素的简单叠加,其内在如何“强大”仍有待进一步揭示。因此,有必要从系统功能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构建一个以“功能导向”为内在底蕴、以“服务导向”为核心展现、以“质量导向”为价值标高的内涵体系,并由此勾勒出强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典型轮廓。

1. 理论内涵

(1)“功能强韧、配置高效”的内在底蕴

从国际金融中心功能的角度来看,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是聚集、辐射与交易^[7],进而实现全球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这一功能与金融本身“资源配置”的核心功能一脉相承^[8]。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不仅应具备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更应具备维护金融稳定与引领全球金融规则的综合功能,这也是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内在底蕴。

不同于区域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是全球金融资本、信息与金融服务的集散地,也是全球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枢纽。这意味着,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不能只是“金融孤岛”,而应是四通八达的“资源枢纽”,依托发达的金融市场与繁荣的金融生态系统,国际金融中心能精准地将汇聚的资源整合、推动金融资源在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中高效流动,并在制度的引导下优化重组,从而提升配置效率与市场韧性。同时,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也应是全球治理中制度输出的核心平台,通过制度创新与标准引领不断巩固其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话语权,因为这不仅是

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性的重要基石,更是彰显全球影响力、提升经济体系辐射力的中坚力量。

(2)“服务强效、贯通实体”的核心展现

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作为支撑经济发展的“四梁八柱”之一,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深度服务于国家战略,围绕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构建起高度契合的服务体系,这种服务能力是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核心展现。“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9]15}这就意味着,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不能是虚拟经济的“游乐场”,更不能成为脱虚向实的“避风港”,而应是服务国家战略的“主战场”、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全球经济形势不断演变、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国际秩序面临重塑的背景下,金融对实体经济各关键领域的精准对接与持续赋能也面临着更高的要求与挑战,尤其是在支持结构转型、技术进步、区域城乡协调发展与应对人口老龄化等方面。而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以下简称金融“五篇大文章”)提供了关键抓手。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既是金融体系固本培元、强筋健骨之举,也是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破题之钥,具体而言,“科技金融要迎难而上、聚焦重点”“绿色金融要乘势而上、先立后破”“普惠金融要雪中送炭、服务民生”“养老金融要健全体系、增进福祉”“数字金融要把握机遇、重视安全”^{[9]60},这也对国际金融中心提出了相应要求。因此,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成为连接国家战略与市场机制的桥梁,既能“承上启下”,又可“左右逢源”,锚定“服务实体”的航向不偏移,构建起响应迅速的服务体系,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在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在变化中“应变求新”,为实体经济提供持续的金融支撑。

(3)“质效强劲、协同进化”的价值标高

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看,“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9]14},也是“十五五”时期贯穿经济工作各领域的主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经济和金

融一盘棋思想”“统筹推进经济和金融高质量发展”^[1]。这意味着,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既要成为经济和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又要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实现质量与效率的双重跃升,这也是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价值标高。

与“规模式”增长不同,高质量发展是由“有”到“优”的标志,也是其能否行稳致远、长久居于全球竞争高地的根本所在。高质量发展的国际金融中心不仅要在规模上“有其形”,更要在质量上“成其势”,实现从“量的积累”向“质的跃迁”的跨越,这不仅意味着其须具备高水平的金融创新能力和卓越的风险抵御能力,更需要在制度成熟性、市场规范性、开放性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做好标杆,形成制度、市场、风险防控与开放格局的联动优化。唯有在多维度实现良性循环,才能推动金融创新、监管创新与开放创新的协同升级,构筑行稳致远、充满活力的“金融生态系统”。因此,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必须立足高质量导向,实现稳定性与创新性的平衡。

2. 典型轮廓

自建设金融强国战略提出以来,不少学者从特征的角度出发,对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所须具备的核心特征进行了深入阐述,然而何为“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尚无统一论。如,何德旭等认为,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个国家硬实力的体现,其具体表现为拥有强大的金融系统定价权,尤其是拥有较强的国际市场定价能力和交易权利^[10];王擎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应具有强大的金融市场聚集力、辐射力与定价权,具体表现为拥有强大的金融市场规模、高度聚集的国际金融机构、高度开放的金融市场与大宗商品定价权等^[11]。此外,也有学者指出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还应具有国际金融规则制定话语权和调动全球资本、高效配置境内境外资源服务本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12-13]。除了从金融视角对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特征进行阐述,也有学者指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在“国际”而非“金融”,因为相比于金融体量大这一特征,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更应聚焦于金融资产的价

格与国际市场的一致性、金融产品在国际市场交易时的自主性与金融机构在国际市场提供服务时的自主性 3 个方面^[14]。

党中央始终高度关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早在 1986 年,国务院批复《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时就明确提出,应当把上海建设成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之一^[15]。此后,相关政策持续稳步推进,如 2023 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9][146]};《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再次明确将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16]。2025 年 4 月 21 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进一步提升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从提高跨境结算效率、优化汇率避险服务等 5 个方面提出 18 条重点举措,以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与影响力^[17]。除中央,地方政府也相继颁布系列政策方案促使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如,上海市制定并实施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等政策法规,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保驾护航。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称得上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只有三座,分别是阿姆斯特丹、伦敦与纽约。事实上,从阿姆斯特丹的衰落到英国的崛起再到美国的霸权,国际金融中心的更迭史就是金融强国的兴衰史。依托发达的造船业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16 世纪下半叶阿姆斯特丹就迅速成为国际贸易中心,此后,一系列金融创新促使阿姆斯特丹向国际金融中心演变。1608 年,阿姆斯特丹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证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这是首次为证券交易提供规范化服务的场所。次年,荷兰建立了阿姆斯特丹银行,开创了现代银行制度的先河。此外,凭借仓储货物的独特优势,阿姆斯特丹在货物销售方面拥有较大的主动权,也使其成为欧洲商品的定价中心^[18]。然而,随着信贷危机及战争的接连发生,阿姆斯特丹国际金融中心逐步走向没落,伦敦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1694 年英国创办英

格兰银行,这是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随后英国银行的数量不断扩大,银行体系逐步完善。1816 年,英国通过《金本位制度法案》,并于 1821 年正式确立金本位制,这使得英镑迅速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霸主地位,这进一步巩固了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提供了契机,通过向外出售战争用品及发行政府债券,美国从债务国转变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而随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为美元的霸权地位奠定了制度基础。直至今日,纽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伦敦是全球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二者仍在国际金融中心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指:聚集了全球重要的金融机构和相关服务产业,具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完整的金融自主权、繁荣的金融生态系统、显著的国际影响力和强大的金融创新活力的国际化城市。

3. 判定标准

根据上述对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义,结合相关政策文件中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相关要求,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应具备以下核心特征(图 2):发达的金融市场、完整的金融自主权、繁荣的金融生态系统、强大的金融创新活力、国际化城市。

(1) 发达的金融市场

作为实现金融资产交易和金融资源配置的主要场所,发达的金融市场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心脏”,其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稳健运行源源不断地提供动力保障。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想要实现全球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依赖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一方面,发达的金融市场要求其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完善的交易制度,这不仅使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要素的进入成为可能,也为交易者交易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凭借透明且高效的运行机制,发达的金融市场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衍生品市场及外汇市场等在内的多层次市场体系提供了有效支撑,并凭借价格发现与风险分散等功能将资源精准引导至优质的行业与企业,促使资源配置效率和合理性实现双重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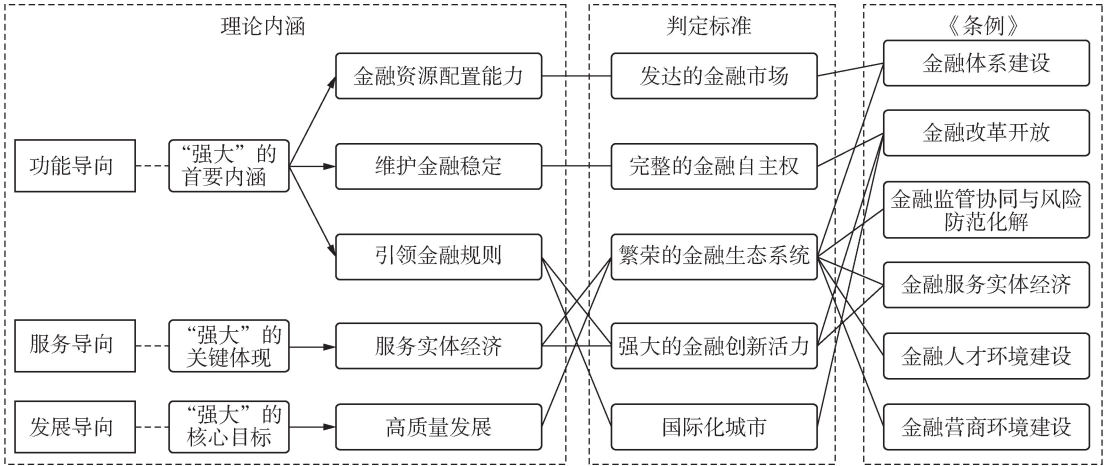


图 2 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判定标准^①

(2)完整的金融自主权

完整的金融自主权是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定盘星”，不仅是保障一国产业链安全运行和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抓手，更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影响力的集中体现。一方面，金融强国一般都拥有掌握国际市场定价权的国际金融中心^[19]，这就要求其不能只是“价格接受者”，而是要拥有涵盖大宗商品定价权、基准利率定价权等在内的金融自主定价权，这不仅离不开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更离不开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与健全的金融监管网络。另一方面，完整的金融自主权还要求其在政策、规则的制定与实施等方面独立自主。具体而言，对内能够根据经济情况自主制定并实施符合本国国情的货币政策，以维护国内经济的平稳运行；对外能够确保开展国际业务时拥有规则制定权，能够自主决定金融产品设计、发行及交易规则，在各个领域建立“中式标准”，也能够不受外部限制自由开展国际业务。“价格话语权”与“规则制定权”的双重内核，使国际金融中心不仅构筑起强大的金融风险“防火墙”，又树立起引领全球金融发展的“风向标”。

(3)繁荣的金融生态系统

繁荣的金融生态系统是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压舱石”，为金融市场的高效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首先，应具备“广”且“强”的金融机构。这不仅意味着金融机构的数量要多、种类

要广，涵盖证券、银行、保险等各个金融领域，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网络，还意味着金融机构的实力要强，特别是应该拥有全球重要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自身实力较为雄厚，且拥有广泛的国际业务布局，能够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发挥关键作用。其次，应具备发达的金融基础设施。发达的金融基础设施（如先进的支付清算系统、完善的征信系统等）不仅为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提供了保障，也有利于金融风险的规避。最后，应具备良好的金融营商环境。以完善的制度保障为例，不仅应涵盖全面的法律法规，还应包括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信用评级制度等，能为金融活动设定清晰边界。

(4)强大的金融创新活力

强大的金融创新活力是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助推器”。事实上，影响重大的金融创新活动往往都聚集在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如世界上第一个证券交易所成立于 17 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建立在 18 世纪的伦敦，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就是当时世界上顶级的国际金融中心。原因在于：一方面，强大的金融创新活力可以促使国际金融中心产出更多的金融创新服务和金融创新产品，这不仅满足了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促使国际金融中心资源配置效率和风险防范能力得以提升。同时，全球优质金融资源的流入又进一步扩大了

^①《条例》指《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2024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国际金融中心的规模,不仅提升了其国际竞争力,又进一步强化了创新能力,由此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聚集着强大的金融机构、良好的营商环境与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这本身就为金融创新活动的发生提供了土壤。

(5)国际化城市

城市层级的跃升是成为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想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必先成为国际化城市^[20]。国际化城市的核心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其一,城市的能级要高。这就要求其应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健全的制度体系及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体系等,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城市参与全球竞争的基石。具体而言,雄厚的经济实力不仅意味着经济总量要高,更意味着经济结构要多元;健全的制度体系包含法律法规、行政管理规范等,为金融活动安全地进行提供有力支撑;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体系涵盖交通设施、通信设施等,为城市高效稳定地运行提供重要保障。其二,城市的国际影响力要强。这不仅体现在政治影响力与文化影响力方面,更体现在全球金融体系的话语权上,即该城市不仅是全球金融交易的主要场所,也是全球金融规则的“制定者”与“传播者”。其三,城市的流动性要强。这体现在以常驻外籍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等指标衡量的人口流动性、以经济外向依存度等指标衡量的投资流动性和以港口货物吞吐量等指标衡量的贸易流动性等方面^[21]。

三、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现实基础

立足于“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新阶段,系统审视我国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与短板,具有承前启后的战略深意。作为衡量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权威指标,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已成为被广泛认可的衡量全球金融中心发展的“风向标”。表1展示了最新一期(GFCI37)排名中,中国排名前五的城市在全球的排名情况^①。

从表1可知,广州不仅进入榜单的时间最晚(GFCI21,2017年3月),也从未跻身于全球前十,其历史最高排名仅为全球第19位。深圳和北京的历史最高排名分别位列第5位和第6位,但北京从未进入过全球前五,且在最新排名(GFCI37)中仅位列全球第20位;深圳在最新排名(GFCI37)中位列全球第9位,但此前仅进入全球前五1次,全球前十9次。这些城市相比于香港和上海国际竞争力还相对较弱,因为香港自入榜以来,在全部37次排名中均稳居全球前十,且36次位于全球前五;上海最新排名位列全球第8位,此前也累计21次进入全球前十,15次进入全球前五。基于上述排名情况,并结合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相关要求,当前我国打造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聚焦在香港和上海两座城市,因此,此次研究所指的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也特指香港和上海。

表1 我国部分城市全球排名情况

城市	首次进入榜单时间	首次进入全球前二十时间	进入全球前二十次数	进入全球前十次数	进入全球前五次数	最新排名	历史最高排名
香港	2007.3 (GFCI1)	2007.3 (GFCI1)	37	37	36	3	3
上海	2007.3 (GFCI1)	2009.9 (GFCI6)	30	21	15	8	3
深圳	2009.9 (GFCI6)	2009.9 (GFCI6)	22	9	1	9	5
北京	2007.3 (GFCI1)	2010.3 (GFCI7)	21	10	0	20	6
广州	2017.3 (GFCI21)	2018.9 (GFCI24)	2	0	0	34	19

① 数据来源:英国智库 Z/Yen 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共同编制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

1.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现状

图3展示了2007年以来上海、香港、纽约、伦敦及新加坡五大国际金融中心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的变化趋势。图3显示,在首轮评估中(GFCI1,2007年3月),上海与伦敦、纽约存在显著差距(约200分),此后,上海得分呈稳步增长态势,与其他主要金融中心差距逐步缩小,并在部分年份实现了对香港(GFCI27-29)和新加坡(GFCI27-29、31)的阶段性超越。香港则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与纽约和伦敦的差距也在逐渐减小。这表明,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与完善的金融体系的有力支撑下,上海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成效显著,其全球金融竞争力正在稳步提升。

(1) 坚实的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自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源^①。202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为134.91万亿元,同比增长5%,仅次于美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②。具体而言,对外贸易方面,2024年外贸进出口总值达43.85亿元,同比增长5%,连续八年位居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制造业方面,2024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完成40.5万亿元,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位居全球第一;网络零售方面,2024年网上零售额高达15.5万亿元,连续12

年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③。此外,中国也连续19年稳居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分析上海和香港的具体情况可知,上海2024年的GDP总量为5.39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位^④;香港的GDP为3.18万亿港元,虽位居国内第六,但人均GDP高达42.22万港元,位居全球前列^⑤。坚实的经济基础不仅为抵御外部金融风险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筑牢了根基。

(2) 完善的金融体系

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至今已经历了4个重要阶段:奠定金融体系发展框架的起步阶段(1978—1990年)、初步形成金融体系的探索发展阶段(1990—2000年)、金融体系不断完善的稳步发展阶段(2000—2012年)及全面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22]。在此过程中,中国逐步形成了包含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在内的多层次金融机构体系,货币、股票、外汇等协调发展的金融市场体系及“一行一局一会”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截至2024年末,我国金融业增加值达9.85万亿元,同比增长5.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408.3万亿元,同比增长8.0%;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495.59万亿元,同比增长7.5%,其中银行业总资产达444.57万亿元,稳居世界首位^⑥。就上海和香港而言,2024年上海金融业增加值达8 072.73亿元,同比增长7.9%;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3 650.30万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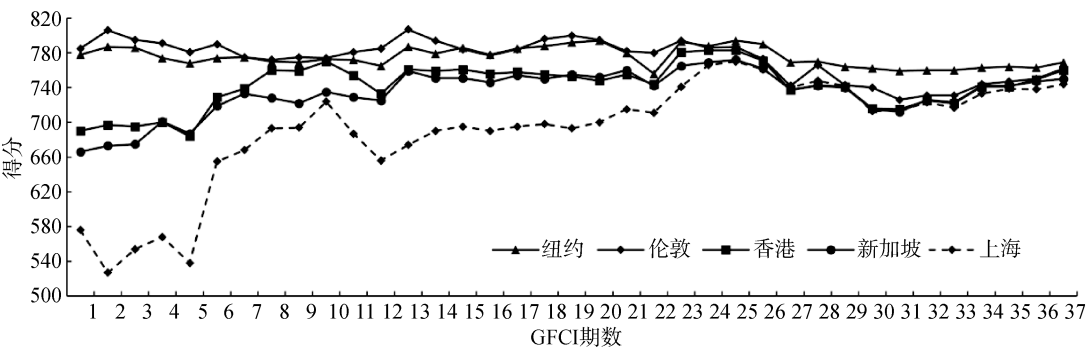


图3 五大城市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得分

①③ 数据来源:中国政府网。
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④ 数据来源:上海市人民政府官网。
⑤ 数据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
⑥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同比增长 8.2%^①,位居全球前列;持牌金融机构 1 782 家,其中外资金融机构占比超 30%^②;跨境人民币收支总额达 29.8 万亿元,同比增长 30%^③。香港则继续保持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地位,人民币存款超过 1.07 万亿元;银行体系资产总额达 28.5 万亿港元;外汇基金资产超 4.08 万亿港元^[23]。

2. 面临的困境

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稳步前行、成效显著,尽管各项指标都保持稳健增长,但对标国际仍有差距。表 2 展示了 2021 年以来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前十的城市。数据显示,期间上海的最高排名为第三名(GFCI29),仅落后于纽约与伦敦,但其排名并未保持稳定,存在较大的波动,在最新一期排名(GFCI37)中仅位列第八位;香港虽稳居全球前五,但仍在与新加坡争夺第三席位,尚未打破纽约和伦敦的“垄断”地位。由此可见,尽管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强起来”的路上仍有不少短板与差距。

(1)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足

人民币国际化是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24],尽管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已取得不俗成就,但其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一方面,人民币全球支付份额

虽稳步攀升,但总体水平仍相对较低。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发布的数据可知,近年来,人民币的国际支付份额实现了从 0.31%(2011 年 10 月)至 4.13%(2025 年 3 月)的显著增长,国际排名也从第 17 位(2011 年 10 月)上升至第 4 位(2025 年 3 月),人民币的跨境支付能力持续提高。然而,相比于美元、欧元等货币,人民币的国际支付份额仍有不小差距(图 4)。2025 年 3 月,美元、欧元、英镑的市场份额分别为 49.08%、21.93%和 6.64%,人民币虽位列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2025 年 3 月),但其支付份额仅占美元份额的 8.4%。另一方面,人民币在全球央行持有的国际储备中占比不高。截至 2024 年末,全球央行持有的人民币储备约为 2 497 亿美元,仅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 2.18%,虽相比于 2016 年刚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时增长 1.1 个百分点,但仍落后于美元(57.8%)、欧元(19.83%)和日元(5.82%)等,位列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第六位^④。相比于传统储备货币,人民币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2)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短板

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市场稳健高效运行的基础性保障,是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和强化风险防控的重要抓手^⑤。中国人民银行于 2012 年

表 2 2021 年以年来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前十的城市

排名	GFCI29	GFCI30	GFCI31	GFCI32	GFCI33	GFCI34	GFCI35	GFCI36	GFCI37
1	纽约	纽约	纽约	纽约	纽约	纽约	纽约	纽约	纽约
2	伦敦	伦敦	伦敦	伦敦	伦敦	伦敦	伦敦	伦敦	伦敦
3	上海	香港	香港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香港	香港
4	香港	新加坡	上海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新加坡	新加坡
5	新加坡	旧金山	洛杉矶	旧金山	旧金山	旧金山	旧金山	旧金山	旧金山
6	北京	上海	新加坡	上海	洛杉矶	洛杉矶	上海	芝加哥	芝加哥
7	东京	洛杉矶	旧金山	洛杉矶	上海	上海	日内瓦	洛杉矶	洛杉矶
8	深圳	北京	北京	北京	芝加哥	华盛顿	洛杉矶	上海	上海
9	法兰克福	东京	东京	深圳	波士顿	芝加哥	芝加哥	深圳	深圳
10	苏黎世	巴黎	深圳	巴黎	首尔	日内瓦	首尔	法兰克福	首尔

① 数据来源:《2024 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 数据来源:2025 年 1 月 16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市政府经济主题记者会。
③ 数据来源:2025 年 3 月 24 日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的 2025 年上海市跨境人民币业务工作会议。
④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⑤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统筹监管金融基础设施工作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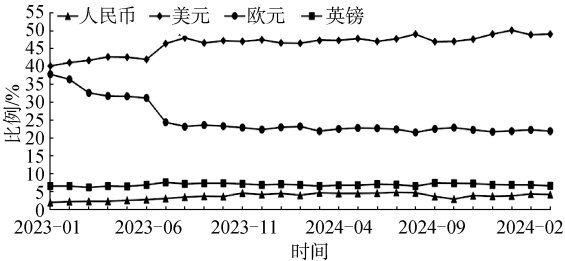


图4 人民币及其他主要货币全球支付占比

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设,2015年10月8日,CIPS系统(一期)正式上线运行,这不仅丰富了我国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更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支撑。然而,CIPS的全球影响力相对有限,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首先,参与者覆盖广度不足。截至2025年3月,CIPS共有170家直接参与者、1497家间接参与者,虽相较于成立初期参与者数量有显著增加,增幅分别高达794.74%和750.57%^①,但相较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11000余家参与者,参与体量还较小。其次,参与者的地域集中度过高,国际化程度不足。在1497家间接参与者中,亚洲区域参与者达1091家,占比72.88%,且这些亚洲参与者中,超过半数(560家)为境内参与者。最后,业务规模存在代际差距。经过数10年的系统性建设,CIPS已取得显著成就,业务处理能力逐年攀升(图5和图6),如2023年CIPS累计处理人民币跨境业务661.30万笔,处理业务金额123.10万亿

元,同比增长50.3%和27.3%,这也是清算金额首次突破百亿大关,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动能^②。但是,与SWIFT的业务处理规模相比,CIPS仍有较大差距,2023年CIPS日均处理业务数量为2.59万笔,而SWIFT平均每天可处理约4200万条金融信息,是CIPS的1620余倍。

(3)金融营商环境有待优化

金融营商环境是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赖以生存的“土壤”,其为金融市场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金融营商环境还有待进一步优化。一方面,金融人才队伍不足。截至2023年末,全国共有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10.7万个,从业人员1235.5万人,相较于2018年分别下降了21.9%和32.0%^③。其中,本科学历从业人员占比48.9%、研究生学历占比6.1%,高素质专业人才储备仍严重不足^④。此外,相比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和上海在人才队伍建设上也显差距。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上海有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7426个,从业人员54.7万人,仅占全市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4.18%^⑤,同期香港金融业的就业人数近26.91万人,占整体工作人口的7.3%^⑥。反观纽约和伦敦,两者金融业就业人数占比长期维持在10%和25%^[2],香港和上海人才队伍建设亟待提速增效。另一方面,金融治理效能有待提升。虽然上海金融法院的设立对营造良好的市场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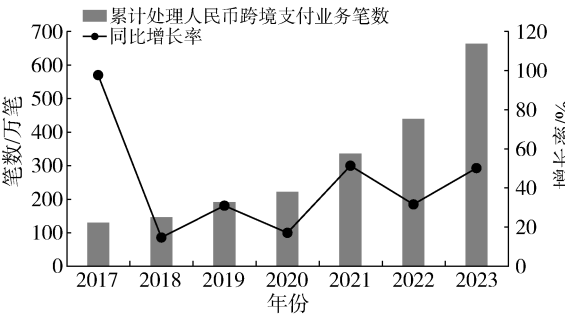


图5 CIPS 累计处理人民币跨境支付业务笔数及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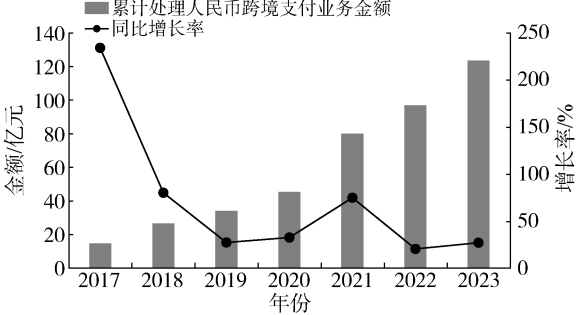


图6 CIPS 累计处理人民币跨境支付业务金额及增长率

① 数据来源: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责任公司(CIPS)官网。
 ②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③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四号)——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一》。
 ④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4》。
 ⑤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局。
 ⑥ 数据来源:香港金融管理局。

境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金融治理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不同监管部门在部分领域的监管标准存在差异、一些交叉领域和新兴领域的监管框架仍存在滞后性等。此外,金融治理的国际竞争力也存在不足,如根据《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 2023》显示,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在国际金融治理竞争力指标中分别以 58.14 分和 11.46 分位列全球第 9 位和第 31 位,与美国(85.71 分,第 1 位)和英国(64.48 分,第 6 位)等主要金融大国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一差距直观映射出我国在构建开放、高效、国际化的金融治理体系方面,仍面临亟须提升和优化的空间。

(4) 国际竞争力仍不足

国际竞争力是衡量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金融市场影响力的重要指标,香港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金融市场、健全的制度及开放的营商环境等优势,已展现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相比之下,尽管上海国际影响力近年来持续提升,但其国际竞争力仍有限;其一,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不足。截至 2024 年,上海持牌金融机构 1 782 家,其中外资金融机构 555 家,占比 31.14%^①,且外资金融机构以银行业机构为主,其他领域参与度相对较小,其国际化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此外,从外资在沪的投资情况来看,近年来,外资在沪的投资金额稳中有降(图 7)。数据显示,2024 年,上海实际使用外资 176.73 亿美元,同比减少 26.6%^②。其二,中外存在制度上的壁垒。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根植于我国基本国情,受文化习俗差异影响,外部金融机构很难适应我国相应的规章制度,“引进来”的难度较大。同样地,我国金融机构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面临相同的困境,这不仅导致我国国际化金融产品的研发成本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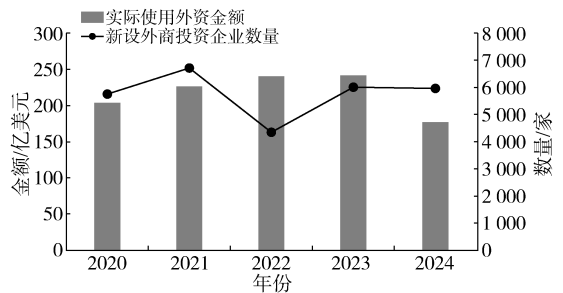


图 7 上海吸引外资情况

效率低下,更制约了金融高水平开放的进程。其三,缺乏国际市场定价话语权,“上海价格”影响力仍不足。当前,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主要掌握在英美等国家手中,尽管中国是石油的进口大国与消费大国,但在石油的定价上话语权仍较弱。

四、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现实路径

1. 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其一,扩大“上海价格”的国际影响力。一方面,应大力发展碳金融,进一步完善碳市场交易机制,扩大交易品种,出台专项激励政策,引导钢铁、石化等高排放行业有序入市,提升其市场活力与交易规模。同时,加强与其他碳交易市场的合作与交流,如布局上海碳市场与国际碳边境调节机制的衔接机制,努力提高上海在全球碳交易市场上的话语权,积极争取国际碳定价权。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提升“上海胶”“上海金”“上海油”等基准价格的国际影响力,通过规范化、透明化的交易机制和高效的结算体系,逐步形成以“上海定价”为核心的国际定价体系。具体地,应用端应尽快出台指导性意见,鼓励大型国有能源与金属进出口商在国际长期采购合同中,率先采用“上海胶”“上海金”“上海油”作为辅助计价基准或核心结算基准,形成价格应用的示范效应;交易端可试点简化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RQFII)参与特定期货品种的登记流程,适度放宽其在交易保证金与资金跨境划转方面的限制,降低国际参与者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生态端应加快金融衍生品创新步伐,探索开发跨市场、跨品种的套利组合与指数化产品,为全球交易者提供高效且低成本的风险对冲路径,进而增强“上海价格”体系的市场深度与运行韧性。

其二,加快构建上海国际绿色金融枢纽。一方面,应加快推进绿色金融创新产品的研发,

① 数据来源: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
② 数据来源:上海市人民政府官网。

在现有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等产品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产品谱系,以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绿色金融需求,形成覆盖全产业链、贯通国内外市场的绿色金融生态。另一方面,应加快完善绿色标准体系,建立统一、科学、可操作的评估标准,以明确的行为准则防范“漂绿”现象的发生,确保绿色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应强化与国际绿色金融体系的对接,推动上海成为国际绿色资本流动的“枢纽港”。

其三,持续深化数字人民币战略布局。截至2025年4月7日,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系统已正式覆盖东盟十国及中东六国,这使得全球超三分之一的贸易结算可以摆脱对SWIFT体系的依赖^①。2025年6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在上海设立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在此基础上,应充分依托该中心,继续发挥数字人民币交易速度快、交易成本低的优势,不断拓展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场景、扩大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覆盖范围,这不仅为全球贸易结算提供“中国方案”,也为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地位提供有力保障。

其四,进一步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持续推动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不断演进,其与金融的融合也愈发显著,应加快构建金融大数据平台,实现金融数据处理与收集的规范化、标准化。同时,充分发挥上海数据交易所的功能,加快推进金融数据的整合、交易与监管,确保金融数据的安全可靠,为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夯实数据基础。另一方面,应强化特色金融服务平台的效能。目前,上海已建设上海绿色金融服务平台、上海普惠金融顾问综合服务平台、上海市科技金融信息服务平台等,均已取得显著成效,应继续加强其功能建设,充分依托服务平台,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更便捷、更透明的金融服务。

2. 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其一,持续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香港作为联通内地与国际市场的桥梁和枢纽,应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一方面,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通过推动国内企业在外布局并深度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以提升其国际竞争

力。另一方面,持续推动外国金融资源“引进来”,吸引海外金融资本与金融人才汇聚香港,共同为金融市场发展注入活力,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源配置优势。

其二,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一方面,应依托其成熟的资本市场与国际金融经验,深化科创板改革,提高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型企业的水平与效率。另一方面,应通过制度创新和金融工具创新,打造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为科技创新提供个性化、差异化和多样化的金融支持,从而增强香港在全球科技金融领域的竞争力与吸引力。

其三,优化金融制度环境,增强市场竞争力。一方面,应完善市场激励机制,对在金融创新领域表现突出的金融机构予以相应的奖励或补贴,更好地调动金融机构参与金融创新的积极性,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另一方面,应采取政策支持、税收优惠等措施,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及国际创新企业等在港设立地区总部或金融服务平台,进一步提升香港在全球金融网络中的竞争力。

其四,强化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加大金融人才的培养力度。与此同时,积极开展金融基础知识的普及教育,在提升大众金融素养的同时增强其风险防范意识,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软实力”筑牢基础。

3. 深化香港与上海协同发展

香港拥有良好的制度基础、丰富的基础设施及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上海拥有庞大的金融市场,两地协同发展不仅可以优势互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还可进一步提升其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力。

其一,提升两地金融体系的融合度。一方面,应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进一步拓展“沪港通”“债券通”的交易范围与交易机制,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参与。另一方面,应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升跨境支付、清算的效率与安全性,减少跨境成本,保障资金流动的顺畅与稳定。

其二,提升两地金融合作的活跃度。依托

^①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独特优势,上海不仅可以加速自身离岸金融的发展,同时也可以和香港联合开展创新产品的研发,丰富离岸人民币业务品种,增强对全球金融资源的吸引力。

其三,加强两地金融监管协同,统一监管标准,避免存在监管灰色地带,为两地协同创新提供安全保障。金融安全是一切金融活动的前提,其中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是关键,而这离不开强大的金融监管体系。一方面,应不断完善监管框架,构建全方位、无死角的监管网络,确保金融创新的各个环节均纳入监管视野。另一方面,应打通各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监管部门之间的业务隔阂与信息壁垒,促使信息高效流动,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金融风险的发生。此外,也应建立两地金融人才常态化交流机制,促进人才流动,为两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持续注入动力。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4-01-17(01).

[2] 张晓晶. 锚定金融强国目标,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J]. 经济学动态, 2024(2):3-16.

[3] 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锚定建设金融强国目标 扎实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4-02-20(09).

[4] 方先明,刘韞尔,李舞岩. 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的中国方略[J]. 江苏社会科学,2024(2):57-67.

[5] 何宪,熊亮. 金融中心形成和金融人才聚集[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9(9):18-29.

[6] 王国刚,易凌云. 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根本遵循、核心要素和保障机制[J]. 社会科学, 2024(6):136-145.

[7] 孙国茂,范跃进. 金融中心的本质、功能与路径选择[J]. 管理世界,2013(11):1-13.

[8] 白钦先,谭庆华. 论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J]. 金融研究,2006(7):41-52.

[9]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

[10] 何德旭,龚云,郑联盛. 金融强国的核心要素、建设短板与发展建议[J]. 证券市场导报,2024(3):3-12.

[11] 王擎. 建设金融强国指数报告:分析框架、指标体系与评价结果[J]. 金融经济研究, 2024, 39(5):150-163.

[12] 高惺惟. 金融强国的科学内涵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 现代经济探讨,2025(1):1-13.

[13] 董青马,张栋浩. 以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助力金融强国建设[J]. 财经科学,2024(4):5-7.

[14] 朱民,黄益平,李稻葵,等. 扎实推进金融强国建设的着力点[J]. 国际经济评论,2024(4):9-33.

[15] 面向世界 面向二十一世纪 面向现代化 国务院批准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N]. 人民日报,1986-10-24(02).

[16]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24-07-22(01).

[17]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进一步提升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N]. 人民日报,2025-04-23(08).

[18] 潘英丽. 国际金融中心:历史经验与未来中国. 上卷. 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规律:历史与理论分析[M].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0.

[19] 陆磊. 在改革开放中建设金融强国[N]. 人民日报,2015-10-14(07).

[20] 王如玉,王志高,梁琦,等. 金融集聚与城市层级[J]. 经济研究,2019(11):165-179.

[21] 林卡,王丽铮. 城市国际化指标体系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2019(12):81-86.

[22] 张占斌,董小君,郭威,等. 中央党校专家深层次解读建设金融强国之道[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4.

[23] 汪灵犀,江琳,黄晶晶. 香港金融管理局:国际社会对香港发展前景充满信心[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04-28(04).

[24] 吴晓求. 中国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探讨[J]. 金融研究,2010(8):199-206.

From “From” to “Force”: The Connotation, Facts, and Construction Paths of Stro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 FANG Xianming, LIU Yuanxin, LI Wuyan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s a critical period for building up China’s strength in finance through high-quality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thereby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In this process, a stro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s the center of the “six key core financial elements” of a financial powerhouse, shoulders strategic responsibilities such as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global financial resources,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discourse power, and enhancing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Based on the overall requirements of building up China’s strength in finance, the connotation, mission, and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 stro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can be defined in three dimensions: function orientation, service orientation, and quality orientation. Specifically, a stro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should possess developed financial markets, complete financial autonomy, a prosperous financial ecosystem,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strong financial innovation vitality. China’s solid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well-established financial system provide important support for building such a center. At present, Shanghai and Hong Kong have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 stro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However, further progress is needed in four key areas: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financial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refore, we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high-level financial opening-up, improve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and optimize the financial business environment. Following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enhancing Shanghai’s competitiveness and influence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nd consolidating Hong Kong’s status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linkage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thereb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nd better serving the “dual circulation”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building up China’s strength in financ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